



中国村民自治研究现状述评

王惠林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化与推进,关于它的研究也是百花齐放,独树一帜。总结学界的研究,其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路径,着眼于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与深化;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基础路径,强调对制度适应性的考察,注重制度实施结果的测量与解释。两种路径共同构成了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村民自治;村干部;乡村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4) 01-0112-05

112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二〇一四年第十三卷第一期(总第六十九期)

本文选取村民自治的六大关键性问题,围绕村民自治的概念与内涵,村民自治视角下的村干部研究,村民自治视角下的“两委”关系,村民自治视角下的乡村关系、村民自治视角下的社会基础研究以及当前村民自治发展的外部行政环境,梳理当前村民自治的研究现状,试图使村民自治的关键性问题更加清晰化,寻找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

一、村民自治的概念及内涵

围绕着村民自治的内涵,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以张厚安,徐增阳,陈福卫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从村民自治制度入手,认为村民自治是指广大农民通过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而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它包括以下内容:

- (1)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
- (2)村民自治的地域范围是村;
- (3)自治的内容是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 (4)村民自治的形式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5)村民自治的目的是使广大农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而徐勇、黄辉祥、贺雪峰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角度来界定村民自治,强调国家再整合能力。例如,徐勇指出,村民自治是“吸纳和重组农民进入国家政权的方式”,“属于国家组织体制的内在组成部分”。黄辉祥则将村民自治看作是自晚清以来国家通过“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整合乡村社会的延续,是“民主下乡”。

还有吴毅、申恒胜、王玲等人,从村民自治的功能价值入手,认为村民自治是民主路径,推进基层民主的突破口,治理手段等。

二、村民自治视角下的村干部研究

学界主要从村干部与乡镇政府、村民之间的关系入手,来认识村干部的角色,并分析其特点形成的原因。

如祝灵君认为,乡镇政府、村委会主任、村民是动态的博弈关系。当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时,村委会主任没有选择策略的机会。而当乡镇政府给予村委会的利益超过村民所能承诺的利益支付

收稿日期:2013-12-19

基金项目:2012年湖北省教改基金(项目编号:01-22-408032)。

作者简介:王惠林(1989-),女,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村委会主任就会离开村民利益庇护人的角色,在与乡镇政府的联结中寻找自身利益的实现。

张静认为,村干部在村民与乡镇政府之间起着桥梁作用,扮演着双重角色。它的基本角色特征是变化的。村干部致力于在行政系统和村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但是政绩的追求、村庄利益及村民支持等因素会导致村干部一边倒的情况发生。

贺雪峰、阿古智子、李德瑞等则认为村干部的这种角色扮演与当前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以及报酬机制有关。贺雪峰认为,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社会性收益和经济性收益两种,社会性收益是村干部从职位中获得的表达性收益,如声望、权威;经济性收益是村干部从职位中获得一些经济收益。当村干部无法从职位上获得社会性收益和经济性收益时,村干部就会乐于扮演“撞钟者”。他还指出乡镇为了加强对村组干部的控制,将完成任务与报酬挂钩的做法,大大降低了村干部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三、村民自治视角下的“两委”关系研究

两委关系是指农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目前学界主要从村民自治视角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明确村委会的法律地位,解决“两委”矛盾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关于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党支部所面临的形势问题,学界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董江爱、郭正阳为代表,他们认为村民自治给村党支部执政能力建设带来机遇。村民自治推动党的机制创新、领导方式转变、党员队伍建设和群众基础的巩固;易凤兰、姚锐敏在对全国七省市党组织能力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后,对村民自治下党组织的执政能力表现出担忧。她们认为,与村民自治实行以前相比,村级党组织在农村社区的地位和威信客观上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村级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的情况不甚理想,对农村社区的控制能力减弱;徐勇对村民自治视角下农村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持折中的态度。他认为,村民自治使得广大村民、党员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显著提高,这对加强农村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是有帮助的。但是,党的“一元化”管理、干群矛盾、党群矛盾尖锐等问题也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因此,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应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党组织的领导威信。

宪法和法律都对村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规定,村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它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支持和保障”的关系。但是,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两委”矛盾尖锐。黄辉祥、徐勇、易凤兰等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两委”矛盾的根源。

黄辉祥认为,“两委”矛盾的根源是党支部享有

的“领导权”和村委会的“自治权”的对立和冲突。他是从国家构建理论的视角提出此观点。徐勇认为,“两委”矛盾是由于两者权限范围不确定、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党的领导威信下降造成的。因此,要根本解决“两委”矛盾,必须合理划分“两委”职权范围,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巩固党的权威。姚锐敏则认为,“两委”关系产生的根源是法治不健全等问题向农村的延伸,因此,最根本的是要从立法上解决村级党组织领导的制度供给。

对于当前一些地方通过“两票制”、“两推一选”、“一肩挑”来解决“两委”矛盾的做法,学界也是褒贬不一。董江爱、郭正阳对此是高度赞扬的。认为“两票制”、“两推一选”实现了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的有机结合,增强了党支部的民主观念和群众基础,“一肩挑”密切了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而黄辉祥则认为,“两票制”在一定程度缓和了矛盾,但容易使“两委”矛盾陷入“乡村关系”问题的困境。“一肩挑”则会使两委的性质、分工与职责更加模糊。

因此,如何在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解决“两委”矛盾,还有待于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进一步论证。

四、村民自治视角下乡村关系的研究

一直以来,乡村关系问题构成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焦点。乡村关系是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早期关于乡村关系的研究都从“国家与社会”、“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入手。

例如,梁漱溟认为,“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在一新中国文化未得融铸创造时,中国社会陷入文化失调——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

1929年6月5日,根据孙中山先生地方自治的原则,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在乡一级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由于国家政权未考虑到传统的乡邻关系而盲目建制,最终归于失败。费孝通^[4]先生评价说:“在中国政治结合的过程中,用一个合理的和统一的结构来代替参差不齐的传统结构,看起来比较理想。但应当考虑到,这种替代是否必需,以及需要花多大的代价去实施它。”

杜赞奇对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研究指出,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深入,造成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传统的地方绅士精英群体大量流失,取而代之的是掠夺型经纪人,在政府和农民双方从事掠夺,造成了地方的衰退和革命的发生。

由此可见,在早期的乡村关系研究中,研究者都

将乡镇政权与乡村自治放在对立的角度,并且普遍表现出乡镇政权向农村深入的忧虑。

村民自治推行以来,村民自治视角下的乡村关系研究也成为了热点。学者们认为村民自治的实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乡村关系,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仍表现出紧张、矛盾甚至冲突的关系。不过,冲突的焦点大部分与乡镇政策在村庄的具体推行有关。

例如,祝灵君指出,乡村最有可能因为税费负担、干部腐败和公共品的供给无需而产生冲突。就目前来看,围绕着公共财产处置权的争夺构成了乡村矛盾的焦点。在这场争论之中,乡镇政府作为国家在乡村的代理人,负责对乡村耕地的转让、保护、宅基地使用与审批。而农民则由于享有按合同规定的使用权,享有在有效期限内土地不受干扰,不被无端征用的权利。于是,国家授权乡镇政府保证乡村耕地与有效征地权中的合法与非法行为与农民捍卫土地的使用权的行为之间发生了冲突。张厚安、金太军、董磊明认为,乡村关系的紧张化与乡镇、村民自治组织的行为方式有关。乡镇仍然将村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属或派出机构,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的管理方式,而有些村委会只是一味执行乡镇政府的要求,完全听命于乡镇政府,置村民的意见和利益于不顾,这必然失去村民的拥护与支持,造成乡镇与村民的矛盾尖锐化。

还有一些学者如贺雪峰、尹冬华、左捷等,认为乡村冲突的根源是国家体制的问题。如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压力型行政体制、权力与利益的自我膨胀性、现行的财税制度等。

五、村民自治视角下社会基础的研究

与以上基于国家立场来研究村民自治不同的是,近些年来,以贺雪峰、吴毅、项继权、全志辉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研究的视野转向村庄本身,将重心放在对中国农村内生整合秩序的考察上。“以乡村治理为平台和主线,通过阅读和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治理变化及特质,研究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施的过程、机制和结果,注重政策实践后果与村庄内在因素之间的关系”。

例如,贺雪峰将中国农村社会分为传统的“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村民与村民之间彼此了解,谁的才干如何,品质如何,大家都了然于心。同时,大家都彼此熟悉,而自然而然发生信用及规矩,没有谁会越出这种信用和规矩,否则他会受到大家强有力的惩罚。熟人社会中由于传统宗族、血缘、户族、胞族的内生机制,使得村民自治在这种类型的社会推进得较为平稳。

而在“半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的关系由熟识变为认识,由意见总是一致变为总有少数反对派存

在,由自然生出规矩和信用到相互商讨达成契约或规章,由舆论压力到制度压力,有立志变为法治,由长老政治变为能人政治等。由于“半熟人社会”无法造就公众人物,保证选举反映民意,所以村民丧失对选举投票的政治效能感。因此,在“半熟人社会”中推行村民自治,要引进竞选机制,帮助村民与村干部建立信任关系,达到善治。

全志辉、贺雪峰还发现构成村级秩序社会基础的社会关联度在村民自治中的巨大作用。村庄社会关联度是指在村庄内村民因为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互惠关系、共同经历以及经济社会分层产生的社会契约关系和权威——服从关系等等,所构成的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总和。社会关联度强的村,可以有效降低生存风险、经济地获得公共物品、达成生产性合作等。较强社会关联度的村更容易使国家制度在村庄的推行中获得认同感与合法性。

因此,他们认为,在中国仍有九亿农民的背景下,必须找到一个有力的基础性的装置,以向下可以组织社会,向上可以勾连国家,这个基础性的装置就是村委会和村民小组这个熟人社会及其内在的二重构造。现代性冲击下,传统宗族、小亲族、户族、联合家庭组织解体留下的家庭联合碎片,仍然构成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构成村民自治推行的社会基础。

以挖掘本土资源,重视传统家庭组织为基础的村治研究构成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与此俱来的也有对它批评,以徐勇、应星为代表。徐勇认为,将传统的宗族组织作为村治的自组织资源的做法,其村治愿望是美好的,但也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在于经历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大变革,这种已不再具有完整的组织形态,更在于家族组织本身与村民自治体现的现代民主理念是难以兼容的。

因此,体现现代民主理念的村民自治能否与农村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实现良好互动?以及如何实现互动?这样一些问题还值得论证与探讨。

六、村民自治的外部行政环境的研究

行政环境是指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行政系统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包括行政系统之外的环境和行政系统内部环境两个部分。就当前的村民自治而言,构成其发展的主要外部行政环境是农业税的取消。农村社会因为税费政策的急剧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者们在认识到取消农业税给村民自治带来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意识到后税费时代给村民自治提出的挑战。

项继权、徐勇认为,农业税的取消不仅为农民减轻负担,也为村民自治减轻行政压力,促使村民自治由行政化向自治化的“本我”复原。但是税费的取消

也减少了乡村的经济来源，使乡村财政收支矛盾和债务危机迅速暴露出来，村级组织陷入普遍的财政困境。田先红、刘丽芬指出，税费的取消使村庄无法获得稳定、足够的财力支持的情况下，村庄公共权力的运转便失去了物质保证，村庄公共权威出现“真空”状态，给地痞、流氓的掌握村庄权力留下了空间。同时，由于缺乏严肃完善的组织制度和程序，使得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的一事一议制度流于形式。

因此，他们主张，在后税费时代，应当从构建村民自治的财政分摊机制、创新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方式、创新村务公开的有效形式和手段入手，推进村民自治在乡村的有效运行。

杨华、陈柏峰还指出农业税的取消给村庄社会结构、农民生活的价值、村庄的治理带来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造成了村民自治实质内容的架空、农民的民主诉求和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乡村秩序和社会稳定充满变数，因此要从完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村务管理入手，应对后税费时代的挑战。

通过梳理学界二十多年来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可以得出，学界在村民自治的本土化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研究主题上，涉及村民自治内涵、村干部、村委会选举、“两委”关系、村民自治发展的外部行政环境、乡村关系等村民自治的方方面面。研究视角上，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宏观研究，也有注重经验案例的微观研究，还有力图将微观经验研究与宏观理论研究相结合的中观研究。在研究路径上，既有自上而下的制度主义研究，也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基础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文献法、深入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40]、个案研究法等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但从已有对村干部的研究来看，学界多从乡镇对乡村控制体系出发，如报酬机制、奖惩机制、财政体制、动力机制等来考察村干部的双重身份，对村干部的研究基于“保护型经纪人”和“赢利型经纪人”的角色分析框架。因此，在新的研究上，有必要将村干部本身作为研究中心，从村干部本身的行为方式上考察村干部如何处理自己与村民的关系，村干部如何应对乡镇政权的控制，村干部如何沟通乡镇政府与村民关系。在此基础上，理顺“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推进基层民主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厚安.村民自治：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必由之路[J].河北学刊,2008,(1).
- [2] 徐增阳,陈福卫.村民自治的内涵、意义与发展历程[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5).
- [3] 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J].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09:207.

- [4] 黄辉祥.“民主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村民自治生成的历史与制度背景考察[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9).
- [5] 贺雪峰.张厚安.村民自治：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必由之路[J].河北学刊,2008,(1).
- [6] 吴毅,李德瑞,二十年农村政治研究的演进与转向——兼论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兴起与终结 [J]. 开放时代,2007,(2).
- [7] 申恒胜,王玲.村民自治的价值与意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6).
- [8] 祝灵君. 授权与治理——乡镇政治过程与政治秩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06.
- [9] 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78-79.
- [10] 贺雪峰,阿古智子.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兼谈乡村治理研究中的若干相关话题 [J]. 学习与探索,2006,(3).
- [11] 贺雪峰,王习明.村组干部的更替与报酬——湖北J市调查[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2).
- [12] 董江爱,郭正阳,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J].理论探索,2006,(1).
- [13] 易凤兰,姚锐敏.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党组织领导的现状调查与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
- [14] 徐勇,徐增阳.论村民自治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4).
- [15] 黄辉祥.“两委”矛盾：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张力——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尝试性解释[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
- [16] 徐勇.论村民自治背景下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协调[J].学习与探索,1998,(1).
- [17]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18]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104-105.
- [1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0-15.
- [20] 张厚安,谭同学.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湖北木兰个案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1,(1).
- [21] 金太军,董磊明.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的冲突及其对策[J].中国行政,2000,(10).
- [22] 尹冬华,左捷.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J].宁波党校学报,2004,(4).
- [23] 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47.
- [24] 贺雪峰,刘锐.熟人社会的治理——以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 [25]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政治学研究,2000,(3).
- [26] 贺雪峰,全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

- 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
- [27] 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J].社会学研究,2005,(1).
- [28] 项继权.“后税费时代”的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对湖北及若干省市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6,(6).
- [29] 徐勇.村民自治、政府任务及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外部行政环境的总体性思考 [J]. 中国农村经济,2001,(11).
- [30] 田先红,刘丽芬.后税费时代的村庄公共权威:路径与选择[J].古今农业,2007,(1).
- [31] 杨华,陈柏峰.取消农业税后的村民自治:社会基础、挑战及对策[J].调研世界,2009,(7).
- [32] 吴毅. 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33] 徐勇.南农实验——农民的民主能力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孔康伟]

Review on Practice of Political Autonomy by Villagers in China

WANG Hui-lin

(School of Marxis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43007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and advanc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r autonomy, relevant researches are flourish and innovative. The paper summarizes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finds two main accesses to the topic: one is the top-down system, focusing on the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legal system concerning villagers' autonomy; the other is a bottom-up community-based path,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adaptability of the system and focusing on evalu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its execution. Together the two paths form the basis of researches on the current villager autonomy.

Key words: villager autonomy; village cadre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villages

(上接第 106 页)

地的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绿色酒店品牌营销策略是酒店长远发展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我们要不断的了解市场需求,跟上时代的脚步,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参考文献:

- [1] 魏明侠.绿色营销的机理与绩效评价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2,(2).
- [2] 唐浩.现代营销理念在酒店经营中的应用[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9).
- [3] 王俊艳.基于手段——目的论的经济型酒店品牌定位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2008,(5).
- [4] 张文娟.基于区域整体利益的旅游目的地品牌营销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0,(10).
- [5] 李莉.我国经济型酒店品牌经营策略研究[J].兰州:兰州理工大学,2009,(4).
- [6] 金怀玉.当代我国酒店营销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生产力研究,2007,(4).
- [7] 陈的非.绿色酒店——我国酒店业永恒的选择[J].当代经理人,2006,(6).

[责任编辑:石芬芳]

On Problem Existing in Development Green Hotel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Yan'an University, Yan'an716000,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consume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ealth. Green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fashion. Green hotel can attend both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profits, thus developing green hotel and green marketing is the only way to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otel industry. The paper sets out to illuminate the concept and significance of green hotel and analyze the problem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hotel.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green hotel; hotel marketing; green hotel brand